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符号机制、挑战与路径

冯月季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元符号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过程中具有文化原型的功能，生成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但同时元符号的表意机制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面临着现代性语境转换的压力和挑战。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文化根基，我们一方面要夯实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域”的意义内核，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创造性转化的路径和机制，站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立场上，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型内涵，并且融入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国家文化符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提供持久的意义资源和文化动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符号；无限衍义；集体记忆；原型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22）02－0025－08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220304.007

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随之产生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构成要素、实践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从符号学视角出发是一种较为新颖独特、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的理论路径。例如阐述民族代表性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机制；[①]或者运用卡西尔（Ernst Cassirer）文化符号学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机制；[②]或者从文化符号塑造民族认同和“符号域”理论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符号机制和实践路径。[③]通过上述文献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人作为符号化存在这种观点为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符号学取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近年来有学者在卡西尔“人是符号化存在”定义基础之上提出了“人是元符号存在”的观点，所谓元符号，就是“关于符号的符号，……我们可以把元符号理解为对符号的再度使用。”[④]德国哲学家汉斯·兰克（Hans Lenk）认为，人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元层次上使用符号，即能够以一种无限上升的方式解释符号并使用符号的意义。兰克认为，人类不仅仅能够使用符号，而且还能够创造新的符号，并且将符号的意义进行无限衍义从而创造新的符号，因此，将人理解为元符号的存在更具有合理性。笔者尝试从符号学当中的元符号理论入手，探讨元符号理论对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符号机制、面临的元符号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为增强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寻找可行的实践路径和策略。

一、元符号理论对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意义

将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是卡西尔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人生活在由自我建构的符号世界中，只有通

【作者简介】冯月季，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机制研究”（21BMZ132）阶段成果。

① 田敏，陈文元《论民族关键符号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南宁市三月三民歌节为例》，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1 期。

② 谢清新，王成《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机制——基于卡西尔文化符号学的启示》，载《晋阳学刊》2020 年第 4 期。

③ 范俊《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符号机制》，载《广西民族研究》2021 年第 2 期。

④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71～277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过符号形式才能理解人的独特之处以及文化的本质。从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中不难窥见索绪尔静态符号学的痕迹。众所周知，符号学自诞生以来，涌现出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二元符号学，和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符号学。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以系统论和结构主义为根基，认为符号的意义受到系统和结构的制约，因此属于静态符号学；而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学理论中，解释项使得符号表意突破了系统和结构的制约，具有无限衍义特征，因而属于动态符号学。卡西尔深受欧陆古典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关于人是符号动物的观点尽管揭示了人的某种独特性，但是在通向理解文化形式整体的进程中，卡西尔并未做进一步的追问，即人通过符号形式建构文化整体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不过在其另一部名著《人文科学的逻辑》中，卡西尔有所修正，他说："人文科学则教导吾人去诠释符号……我们不单只要问世界之'是什么'，而且更要问世界之'从何而来'。"① 世界之"是什么"与"从何而来"，是处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而后者显然是一个元层次的问题，它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对世界表象的认知，而更在乎世界表象背后的意义运作过程和生成机制。如果说"人是符号动物"锚定的是世界之"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人是元符号动物"锚定的则是世界之"从何而来"的问题，更进一步的，还有可能揭示世界之"向何处去"的问题。

那么，元符号理论对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究意义何在呢？在问题论述之前，需要阐明的是，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含义相当复杂的概念，围绕其意义解释产生了诸多争议。但是符号学路径为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运用符号学思维能够准确地理解其本质内涵。有学者认为："共同体这一概念凸显的是传统的、历史的、情感的和相互承认的有机结合体，而象征正是催生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共享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工具。"② 这里的"象征"即是表征民族文化特质的符号，但是问题到这里仍然局限于"人是符号动物"的理论框架中，若从元符号理论层面追问，我们需要考察这些建构和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符号是如何生成的，它们存在着怎样的意义结构，它们在历史文化进程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变迁。因为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能在历史某个阶段具有稳定的意义，但是宏观上来看，它的内涵始终在空间和时间变化的范畴中发生演变，这是由表征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的表意机制所决定的。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共同体意识是对'我们曾经是谁、现在是谁'的回答，也是对'我们想要成为谁'的回答。"③

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指向的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民族文化身份关联着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显示出连续性和变异性。"④ 这即是说，民族共同体意识指的是民族群体内部成员的一种个体自我和集体文化身份的认同感，而文化身份是一个意义不断建构的过程，其在一定的语境中显现出恒定的意义表征，然而随着语境的转换，文化身份又被赋予新的意义解释，并且在"可能的实践、关系及现有的符号和观念中被塑造和重新塑造出来。"⑤ 基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种意义建构性，仅依据"人是符号动物"这种传统的符号学观念是无法揭示其意义建构机制的。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是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⑥ 从纵向的历史时间来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是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根据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集体记忆的对象是一个被符号化的过程，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总是在现实情境中对过去的回忆、想象和重新塑造，这个意识再现的过程只有通过符号才会发生，而符号化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只有元符号理论才能揭示符号在意义的链条上呈现出的多层级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123页。

② 赵超，青觉：《象征的再生产：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文化路径》，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③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载《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④ 刘莉：《全球化场域中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建构》，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

⑤ ［英］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⑥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形态和表意机制，由此才能更为完整和透彻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和文化内涵，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从实践层面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实践路径。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符号机制

根据元符号的概念可知，人类在社会文化中创造的元符号不是为了指称某个特定的事物，而是生成一个新的符号，并获得了新的意义解释。因此，“我们所有的新思维、新解释，都是旧有符号文本的累加、变化、移用，人的意识在组织意义上永远是个拼凑巧匠，新的意义实际上大都来自旧符号的‘再符号化’。”① 通过符号的累积不断扩展直至生成庞大的符号集合，这个符号集合就是某个特定的民族群体思维结构和文化心理的元语言，成为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塔尔图符号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洛特曼（Juri Lotman）将这种民族文化的载体称之为“符号域”，“符号域”是一个由多层级符号构成的文化意义系统，“符号域”并非自然形成，它是民族群体运用符号抽象能力对客观世界的编码而生成的，因此“符号域”具有未完成性，并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中华文化延续五千年之久，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光辉灿烂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的形成并非某个社会个体所为，而是民族群体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审美实践中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域”。根据符号表意特征和类型可以将其分成以下几个类别：第一，自然物象符号。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许多原本不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然物象被意识符号化以后，开始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内涵。例如黄河、长江等地理空间被符号化以后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第二，神话或历史人物符号。在中华文化漫长历史演绎过程中出现的神话传说或历史英雄人物，他们的精神特质融入文化系统中，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例如黄帝被誉为华夏人文初祖，当代中国人也被称之为黄帝子孙。第三，习俗礼仪符号。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纪念仪式等，此外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法理秩序、礼仪纲常等符号系统。第四，文化艺术符号。例如语言、绘画、书法、诗歌、舞蹈、戏剧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它们对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些文化符号是在民族长期的历史叙述中被创造出来的，今天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民族文化符号在历史范畴中经历了不同形态和意义的变迁，民族共同体成员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对现有的文化符号进行编码，创造出新的意义解释附着其上，由此生产出承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的文化符号。从符号表意的角度来说，民族文化符号的这种演进机制就是一种元符号活动，“元符号性，是人类意义活动的根本符号品质。人类意义活动不断地处理符号与符号的关系，处理如何从符号生成符号的问题，是一种元意识活动。”② 例如作为当下中华文化重要象征的长城文化符号，其符号内涵在历史进程中也经历了多次演变。长城在修建之初的目的是中原王朝用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在日后的历史变迁中，人们在这一原型符号基础上延伸出 3 种不同的意义解释：其一是将其作为保卫华夏的军事防御工程；其二是在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典故中将其作为秦始皇暴政的象征；其三是将长城看作是中华民族封闭保守、文化落后的象征。长城文化符号的这种多义性和流变性具有典型的元符号特征，正如约翰·迪利（John Deely）所指出的：“在经验范畴内客观地构成的符号看起来派生的、不稳定的地位乃是由如下事实造成的：任何一个对象都能够变成任何其他对象的符号，而且经验中的每一个对象都开始于或迅速地变成了好几个（随境况和时间而变化的）其他对象的符号。”③

随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逐步成型，长城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曾经被视为保守落后、制造民族隔阂的负面意义逐渐消退，随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和抗日战争的爆发，长城被赋予了抵御外辱、捍卫民族权利、自强不息、精诚团结等新的意义内涵，新的时代背景下，爱好和平、吃苦耐劳、热爱国家、众志成城等现代价值进一步融入到长城文化符号内涵中，从而逐步确

①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76～277 页。

②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第 275 页。

③ ［美］约翰·迪利《符号学基础》，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79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立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品格象征符号的地位。在长城文化符号的演变轨迹中，长城原型符号所延伸的3种意义解释，在其后历史语境中的赋义活动中，只有第一种意义解释被保存下来并进行了意义的丰富化，其它两种具有负面特征的意义解释逐渐被遮盖和消解，这正是元符号活动的结果，新的符号意义创造和阐释过程中，原型符号的意义只有部分进入了次一级符号文本中，经过再造之后构成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本质上是一个符号化的建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符号意义都会进入到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当中，因为“记忆是一系列被选择、被征用、被赋予意义的符号。”① 德国著名文化记忆研究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记忆材料中的那些潜在的、不活跃的或者受到某些历史文化制约的因素都不会进入到人们的记忆框架中，因为元符号活动的特征，经过再叙述的符号文本生成新的符号之后，其形态和意义已经发生了明显改观。因此，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研究的视野来看，重要的不仅仅是对现存的民族文化符号进行意义阐释，而需要进一步考察民族文化符号的形态和意义演进机制，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自觉”，我们需要好好看看我们的民族文化，它从哪里来，理解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性，挖掘其内在价值，探索其未来发展之路。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符号挑战

文化符号能够唤起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增强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情感凝聚力，提升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文化认同感，某种程度上来说，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和发展就是民族文化符号创造的过程，元符号所具有的动力表意机制，不断推动着特定历史情境下新的文化符号生产和意义演化，正是元符号的这种表意特征，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才能适应历史语境变化，从而显现出更为丰富的意义内涵和时代价值。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也面临着来自元符号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本身来说，尽管我们有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符号资源，但是在年代久远的历史变迁中，这些传统文化符号资源显得较为散乱，缺乏历史连续性与体系性，这一特征在中国传统神话符号资源中表现的尤为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有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因素，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密不可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具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② 鲁迅认为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导致了中国传统神话信仰的衰落，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在著书立说和读书治学时偏向感性的情感抒发和意境表达，而不擅长逻辑紧密的体系建构也是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意义的式微，例如“昆仑山”作为一个自然物象符号，是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众神居住的场所，应该像希腊神话中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一样被赋予丰富的神话意义，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神话故事叙述中，“昆仑山”的神话符号意义已经不是很清晰了。由于神话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未受重视，没有出现专门记载神话故事的著作，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中国传统神话也都是散落于《山海经》《淮南子》等文献中，因此与古希腊、罗马等神话相比，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神话缺乏体系性。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资源的散乱和不成体系性，也使得其缺乏稳定的意义解释，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面对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压力，传统文化符号“换挡加速”频率过快，尤其是受到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型意义容易遭到解构；其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符号化生产和消费时代，由消费主义和各种流行文化所催生的符号泛滥对传统文化符号价值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稀释甚至遮蔽了传统文化符号的意义内涵。这种现象的产生正是由于元符号本身所具有的动态表意机制造成的，元符号构成了一个开放多元、意义丰富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但同时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传统文化符号

①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3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原型意义被异化，从而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形成了一定的挑战。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前文所列 4 种符号类别中，除了自然物象符号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仍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意义内涵，例如长江、黄河等地理景观符号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根源和血脉这种意义解释基本未变。而其它 3 种符号类别中，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压力或者消费主义导致的符号泛滥的影响，从而与其原型符号在文化内涵上出现了断裂或者遭到了解构。例如在神话和历史人物符号中，女娲可以说是颇具代表性，古籍《风俗通》中曰："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① 除了造人神话之外，汉代刘安等编著的《淮南子·览冥训》中还记叙了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在其后的文学叙述中，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故事内涵逐渐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济事天下、顽强拼搏、英勇无畏的民族气质。然而进入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之后，女娲所代表的那种无私奉献、英勇牺牲、伟大慈祥的文化原型意义却出现了像文学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所说的"魔幻变调"（demonic modulation），在某些文学作品中，女娲的神圣崇高形象被消解，例如在徐坤的小说《女娲》中，表现出一种原始生物性的、充满了丑恶愚昧的生殖意志，而在张广天编导的音乐剧《风帝国》中，彻底颠倒了人神关系，女娲采石补天的精神受到了挑战，最终被人类所抛弃。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解构主义文化风潮的推动下，女娲神话符号意义的"魔幻变调"并非个案，"西游系列""悟空系列"电影中的神话人物符号意义同样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置换变形。诚然，文学艺术创作需要通过想象和创造性丰富故事的意义内涵，但是当戏谑和反讽之名完全被绑架在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的大旗之上，不论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还是受众都有可能迷失意义的边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相对稳定的道德价值伦理观念是否必要。即便在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解构主义文学艺术思潮风起云涌的美国，也依然有相当多学者对之保持了足够审慎的反思。提出"作者意图论"的赫施（E. D. Hirsch）认为，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意义解释有多重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对规范的追求，人作为一种理性化的存在，需要思考对意义的追寻应当保持怎样的道德原则和人文精神。而耶鲁解构主义学派的中心人物保罗·德·曼（Paul de Man）则认为文学阅读的终极目标是寻找主体自我，探索永恒价值，体验崇高，因此文学艺术的创作需要背负一种责任意识。

以此来看，我们当今时代对神话符号的各种"魔幻变调"，对历史人物符号的各种"戏说反讽"，在某种程度上随着解构主义的文化思潮遁入了激进现代性的旋涡中，习俗礼仪符号被片面理解成为封建残余，由此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礼崩乐坏"和道德滑坡，文化艺术符号则在流行文化冲击下变得七零八落。要知道，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艺术符号对西方艺术观念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十七、十八世纪在欧洲一度流行艺术创作和设计的"中国风"（Chinoiserie），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西方艺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时期更是受到了中国传统艺术观念的影响。英国著名艺术史家罗杰·弗莱（Roger Fry）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技法和观念"提前 1000 年预示了西方艺术的发展。"② 大约同一时期，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痴迷不已，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则从中国汉字符号中获得了戏剧和电影艺术创作的灵感。

然而，自近代以"启蒙"和"救亡"为主题的激进现代性将中国落后的根源完全归结于传统习俗礼仪和文化艺术等传统符号体系，认为传统文化符号象征着愚昧陈腐、落后守旧，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运动使得传统文化符号的意义根基受到了动摇。尤其是在当今媒介技术时代，互联网所具有的超文本特征在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加持下，表现出了符号的异化和泛滥，使得符号在网络空间中经历了比传统媒介时代更剧烈的意义扩容，互联网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解构主义特征构成了对传统文化符号原型意义的消解。传统文化符号作为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以及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象征，其意义的消解意味着民族集体记忆的忘却。格罗塞（Alfred Grosser）指出："'集体记忆'在一个集体——特别是民族集体——回溯

① 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 360 页。

② 转引自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36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性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持久的作用。”① 然而，在元符号表意机制的副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当代社会语境特别是互联网空间中遭遇的意义流变，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和认同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历史命题，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路径应对这种挑战。

四、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符号路径

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传统文化符号遭到挑战是一种普遍现象，世界各国都不例外，这是元符号表意机制的客观结果。根据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符号域”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意义体系，是由若干个文化符号子系统构成的多层级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边界性。洛特曼将“符号域”的空间结构划分为内核和外围两个层面，“符号域”的内核是“最发达、结构最严谨的符号系统，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民族自然语，它是一个文化的核心，是符号域赖以存在的基础。”② 而“符号域”的外围则是意义相对松散和活跃的文化符号子系统，正是它们连接起了不同民族类型的“符号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不可避免的，它们最容易在元符号“文化转码”机制的作用下构成对传统文化符号原型意义的冲击。著名的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 Wall）将文化系统分为显形文化、隐形文化和技术性文化3个层面，其中“显形文化成为根基，文化的其余部分概源于此，且围绕其进行建构。”③ 隐形文化则是使得显形文化运作的文化符码，类似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它为显形文化提供情感和心理支撑，技术性文化是可以通过教育、制度、法律、科学等手段学习的文化。从霍尔的观点来看，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就属于“符号域”的内核，技术性文化则位于“符号域”的外围。

依据洛特曼的“符号域”理论和爱德华·霍尔对文化3个层面的划分，我们今天应对元符号表意机制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带来的挑战，就应当进行两条路径的探索。首先需要不断夯实中华文化符号系统中具有稳定性的意义根基，注重对“符号域”的内核部分或者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符号系统的传承发扬。“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④正是对这种历史诉求的积极响应。从实践上来看，最需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进行体系性的建构。正如前文所述，缺乏体系性、碎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自身的短板，使得其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过程中很难提供持续的意义资源，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也不足以全面体现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在各种传统文化符号资源中，创世神话是民族文明起源的始基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但是今天世界神话研究的版图上，却存在着所谓“东衰西盛”的格局，即西方创世神话例如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影响力巨大，而且成为各种艺术和文化创作的故事原型，不仅打造出了庞大的文化产业链，而且向全球范围内成功输出了文化价值观，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具有系统性的神话故事和人物符号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形成的持久影响力。好在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2015年，上海市文化管理部门就启动了“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工程，对中华创世神话进行系统性的文献考证和编纂，目前已出版多卷本文集；2017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有了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资源的挖掘和整理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研究最热点的话题之一，这必将大大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体系性的建构。

如果说神话符号是“符号域”内核中最重要的隐形文化符号系统的话，那么语言符号就是“符号域”内核中最重要的显形文化符号系统，正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言：“语言符号系统是所有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⑤ 德国近代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Herder）认为正是语言符号凝聚起了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认为只有存在独立的语言符号系统，才存在自治的民族。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看作是一种“想

①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② 郑文东《符号域的空间结构——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研究视角》，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③ ［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④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⑤ ［瑞士］费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38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象的共同体”，而民族语言正是“想象的共同体”生成的核心所在。语言符号也是“符号域”中意义最稳定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连同其深层的文化符码生成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意义基模。这一点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中便可窥见一斑，在民族遭受列强入侵之际，许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认为汉字乃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必须对汉字符号系统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到五四时期的汉字拉丁化运动，甚至对汉字的这种拼音化改革还延续到了建国初期。但是最终汉字符号系统对此起彼伏的拼音化变革保持了足够的免疫力，这是因为汉字符号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强烈的同质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核就凝聚在汉字符号系统中。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描述仓颉造字时说：“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物，近取诸身。”[①] 仓颉造字的典故蕴含着中华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并且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美学精神和道德理想，乃是中华文化之于世界文明最独特的贡献。

可以说，汉字作为超稳定的文化符号系统在建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凝聚民族情感方面具有根基性的功能，龚鹏程先生对此有非常清晰的阐释，他认为“构成中国文化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事实上都处在中国文字符号系统的组织和制约中。”[②] 以汉字符号系统为圆心，建构起了中华文化符号多层级的表意结构，通过汉字所表征的自然物象符号、神话或历史人物符号、习俗礼仪符号以及文化艺术符号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意义体系。尽管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遭到了一定的挑战，但是我们看到，以汉字符号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依然存在，并且在与不同文明形态交流互鉴中愈发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意蕴。

应对元符号表意机制挑战的另外一条路径，就应当考虑“符号域”的外围或者技术性文化层面。“符号域”的外围之所以被称之为技术性文化，就在于这个符号系统中的文化比较活跃，容易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发生变迁。科学技术的变革必然会对民族文化符号系统构成外在的压力，正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指出的：“科技发明对文明世界的时空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改变了外在的环境和人的心灵。”[③]历史表明，民族传统文化符号在科技革命推动的全球化文明时代，需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并积极融入全球文明的对话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必须对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元符号性升级，打造既能承载传统文化意蕴又能融入现代价值的国家文化符号，不断夯实中华文化符号系统中具有稳定性的意义根基。国家近期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指出，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能力。洛特曼认为文化符号具有 3 种功能，分别是记忆功能、传播功能和创造功能。以此来看，民族文化“符号域”的内核，即霍尔所说的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主要承载着记忆功能，它们构成了民族集体记忆的元符号，汉代董仲舒认为元者为万物之本，这一“元”的存在，“使生活在这个传统中的个体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即意识到自己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之一员的潜力，并在这个群体中学习、记忆、共享一种文化。”[④] 根据笔者的观察，即使身处海外的华人，也还是更倾向于通过汉语进行交流，也将汉语学习作为子女教育必备的计划，这是一种存在于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即，文化符号的意义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能够在内心意识中生成一种超越个体之上的“我们感”，由此强化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

当然，元符号表意机制也决定了民族文化“符号域”的内核只是具有相对意义稳定性，民族文化“符号域”的外围，即霍尔所说的技术性文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传播功能和创造功能。尤其是在当今媒介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不同文明和文化形态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技术性文化空前活跃，使得民族传统文化符号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必须探索形式契合的表达形态，充分展示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具体而言，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与当今科技手段的融合是非常有益

① 程绍恩，徐婷《周易卦爻筮法十讲》，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61 页。

② 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③ Lewis Mumford. *The Myth of Machine*: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count and World, 1967, p. 284.

④ ［德］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陈国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6 期。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探索路径。在刚刚召开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我们看到这种“科技+文化”的呈现形式令世人惊艳，让全世界懂得了什么是“中国浪漫”，正如媒体所评价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运用新媒体技术和设计语言，融入典型的中国符号和意象，在诠释冬奥主题的同时，展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和理念。”① 以此为出发点，可以预料的是，未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将会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获得越来越多在世界面前亮相的机会，这既是一种文化自信，更是一种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就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并且能够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具备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一旦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具备了这样的符码转换能力，必然能够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彰显出独特的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从而打造出更多具有民族特质的国家文化符号，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持久的意义动力和文化源泉。

On the Meta-semiotic Mechanism of 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ENG Yuej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eta-symbol has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prototype and generates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identity of the n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meta-semiotic expression mechanism also mak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face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of the contextu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identity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should on one hand enhance the core implications of the semiotic domai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stablish and highlight the shared cultural symbols of all nationa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path and mechanism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deeply the prototypal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and create some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that highlight Chinese spirit and Chinese value with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which can provide inexhaustible meaning-making resources and cultural power for the identity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eta-symbol; infinite derivative meaning; collective memory; archetype

（责任编辑　伍琼华）

① 潘鲁生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视效设计，是艺术之美与科技之力的创造性融会》，人民网 http://ent.people.com.cn/n1/2022/0212/c1012-32350731.html.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